

文

“

文与

摘要 以理
了独特的作
诗性气
生命担
比相应
、郭
战
工人

中牛汉的
二月党
责任
生
是
、宠

夫
与哲
胡塞
一把
器物
身
又
意性
至本质直

0' ()-0
量
“
精神面
到的是
、绿原、曾
'文革' 那样的
完全放弃文化批
与社会迫害，逼
延续”^④。可能者从
则是——俄罗斯十
出的

当本文将牛汉
“老诗人”^②的

期间包括

人”，“一律
没有自我、

有其
诚如

舌

很明
牛汉关于校
在为牛汉
它们

程登上

局

征

吉

的

式始终在知识分子和
：拉吉舍夫是俄国
西方启蒙主义的自由
会有关)。普希金是第
。当拉吉舍夫在《从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
说上帝就像我们俄
分子就诞生了。面对
民受伤的灵魂，忧
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
时间里，俄国知识分
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分
反抗黑暗、暴力，追
坚毅；对人民深刻的
神：在苦难中孕育着
信心。所有这些明显

舍夫并肩耸立的先知
出身于贵族阶层，但
秉赋，其孤高的灵魂
醒。在此意义上他们
给他们的不是鲜花和
而他们被流放和送上
不可遏止的忧虑和挚
主与同情。他们为此
也上，不仅肉体上如
冬，他们所追求的理
为一个民族的精神，
着俄罗斯的灵魂。
实际上就是一部思想
上所指的就是十二月
包括与其有精神血缘
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
中的席勒”，他的诗
达了对专制独裁的刻
皇；奥多耶夫斯基在
哀十二月党人写诗答
起熊熊火光”，列宁
刊头题词。格林卡
已成为俄罗斯的经
调给人以心灵的震
因为他们自己而高
圆满。

月党人有着精神血缘
。普希金

颂》曾经给予十二月党人以精神上的启发和意志上
的鼓舞，《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更是赞颂十二月党人的高贵品性和对自由的无限向
往；莱蒙托夫在贵族寄宿中学时就秘密阅读雷列耶
夫的崇尚自由的诗篇，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与十
二月党人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传统，曾以一首惊
世骇俗的《诗人之死》哀悼了普希金这轮俄罗斯诗
歌的太阳的陨落。

十二月党人（包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把这些
独特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写进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再
现了流亡者苦难的人生遭际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品
质，从而使流放成为俄罗斯文学一道独特的人文景
观。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十九世纪的文学是
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
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
基调。……因此，关于受难的精神、忧郁的灵魂，
以及如何才能获救的问题，成了知识分子讨论的中
心话题，也成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
题”^①。

毋庸讳言，“文革”期间确实存在着这种现
象：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执着探索精神，在他们
身上迷失了，他们选择了‘脱胎换骨’，选择了紧
跟队伍的‘革命路线’。”^②但却不能排除，十二月
党人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压抑而不满，目睹农奴制
社会黑暗现实愤懑而无奈，由此激发的反抗情绪和
叛逆精神、乌托邦理想和幻想，都和经历“文革”
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先觉者声气相通；而他
们的流放诗歌所展示出的那种独特的现实批判意
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巨大的道德深度、沉重
的悲怆风格，也很容易引起“平校文学”或“流放
文学”中牛汉们的精神感应和灵魂契合。牛汉有关
干校的诗作与十二月党人的相通之处更在于其“深
刻广大的悲悯情怀、对于民族痛苦的承担、对于生
命尊严的捍卫，使他的胆汁质诗人形象，成为中国
新诗史上人格和良知的坐标”^③。

二

一旦进入历史褶皱和文本内部，最先领略到
的是浸透于牛汉的诗歌肌质中的那种领受苦难的创
作品质。

牛汉自称：“没有我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
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没有特殊的人生经历，
就没有我的诗。”^④

的个体生命，在牛汉的诗中，是那样地鲜活而

牛汉同资历或年龄小于他的许多诗人，都顺着自己的模式写下去，也自甘平庸下去，而牛汉没有。上帝选择他做真正的诗人，所以把他投入炼狱。干校时期的牛汉就像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那样，在诗歌中艺术地再现了流亡者苦难的人生遭际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品质。经历了“文革”尤其是五七干校那种“苦难的历程”后，牛汉体验了生命被困囿和灵魂被摧残的痛苦：“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皮肉的神经和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感觉去感受世界，……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⑩在牛汉的诗思中，苦难与创伤或“伤疤”不止激发了诗人的诗兴，同时影响了他认识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方式。

《半棵树》据说是有感于冯雪峰削瘦的形象而写。其实，这株遭受雷击却傲然挺立的半棵树何尝只是冯雪峰命运的写照，它更渗透着诗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受尽摧残但宁折不弯。尤其是它的结尾：“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止是宿命的宣告，更是带血的预言。而同样是写“树”，《悼念一棵枫树》不同于“半棵树”的依然屹立，这棵枫树被整棵地伐倒；伤害的也不止是枫树本身，而是一个民族所遭受的难以弥合的时代的苦难和心灵的戕害，牛汉为此悲愤地写下“悼词”：“村边的山丘/缩小了许多/仿佛低下了头颅//伐倒了/一棵枫树/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

的确，牛汉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写作方式在诗的炼狱里穿行：“那些年/多半在静静的黎明/我默默地写着诗/又默默地撕了/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谁也无法把它复原)/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谁也无法把它破译)/它们乘着风/翩翩地飞到了远方”(《蝴蝶梦》)；同时，受难的精神使他的诗穿透了现实表象的遮蔽与现存秩序的拘役，而突入生命存在的本质，于是在牛汉的笔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正是在形而上的生存焦虑与形而下的现实苦难间的奔突和磨砺，使诗人及其诗歌“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鹰的诞生》)。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牛汉的诗歌创作显得与众不同：一般人只是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而牛汉却能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美学

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由此，一条通向灵魂炼狱同时又重新发现未来的道路得以铺展开来，真正的灵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开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在牛汉的诗歌中，对苦难的领受是通过生命的担当来完成的，即领受苦难和生命担当是一体两面的构成。这其实是牛汉用诗歌面对灵魂的一种方式。由此，牛汉在诗歌中以痛楚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将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融于一体：一方面呈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沉思和拷问，把生命历程中的大苦难、大折磨凝结为一种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的普遍性的生命哲学思考，并聚结为挥之不去的，渗透在心灵之中和骨髓之中的人格力量。

《华南虎》中的“我”与“老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歌形象：“华南虎”的困厄处境以及它的内心“屈辱”和对自由的希望，与在特定处境中的诗人发生了“命运的邂逅”

生学。他在
一帜。
沉郁调的
以用来
调用己的
的基调慨自
重之生命担

诗作十二月
大、在望中激
他的作不畜

生命的真切
枫树、被研
下的黑暗中
见了灵魂

以
匪
行
出
中
色
烈
的
《

象郭沫
富，但比之
青，牛汉更尖锐
收不掉的习惯》曾
过 / 有一个
习惯——
/ 多少

这
胡风、钱
知识分子的
“七月诗派”的
独立性的不懈追
把诗美追求
着对民族
在坦诚
在知
派

自
打
与

比

七性

任

地

是依然故我。”

究其缘由，杨绛自身出身书香门第，优越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某种“贵族”气质，性情淡泊，视野甚高，不随流俗，同时又善于自我变换，领略了风霜雪雨。这使她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乃至排苦难的生存经验升华为一种愉悦。由此观之，《干校六记》中记录的那些黑暗年代中的种种艰辛，然而作者却以“闲话”，不自怜自怨反而风趣幽默，一方面使她能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透出一种幽默，同时亦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自持，是文人式作家的典型性格。须知，杨绛的散文最能展示作者人格气质的文体，其神韵直追明清文人的小品文，她将几分苍凉凄楚融入一种冲淡自如的境界中显示了超脱、性情的谦和通达。

温克尔曼曾称古希腊艺术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⑨，《干校六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伟大”中淡化了价值判断和对时代重大事件的小插曲，哀乐，而有一种超脱高妙的气质。杨绛的“自我”也是凸显世情、人性的本色杨绛：“作者‘士’，任凭怎样‘然故我’。《干校六记》有的一种高贵的倔强的、高贵的，也非悔来获得，当然也20世纪60年代流行‘自我’，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⑩可杨绛的散文质和人格范式的写法问题，而是存在一种

杨绛，作为“干校文学”的开创者，有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构成了“文学”的不无合理的文学学生《鲁迅与杨绛》里的路上需要黑胡适一样的文

杨绛，作为“干校文学”的开创者，有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构成了“文学”的不无合理的文学学生《鲁迅与杨绛》里的路上需要黑胡适一样的文

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410081。

(责任编辑 刘保昌)